

YIHE TUAN
YANJIU HUI
HUIKAN



义和团研究会

義和團研究會刊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目 录

-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试探·····廖一中 (1)
- 沙俄在八国联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苏位智 (13)
- 如何进一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25)
- 义和团时期威县赵家庄耶稣会伊索雷神父的
日记·····龚杰文译 (35)
- 日本学者评“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佟飞 李世瑜 (39)
-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存有关义和团问题的
外交史料目录·····任 明译 (44)
- 《会刊》八一年二期勘误表····· (58)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试探

廖一中

一、问题的提出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史学界已多有阐述，但往往只是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洋教势力的猖獗这些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原因加以说明，缺乏对山东地区特殊性的深入探讨，以致使这个几乎已成为定论的问题在人们心目中还留下许多尚待研究的空白点。

不少论者人为义和团兴起于山东，是由于山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然而，“首当其冲”并不等于山东遭受侵略最为严重，也无法说明山东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全部原因。况且众所周知，在甲午战后是沙皇俄国向中国“最先伸出魔掌”，在我国东北夺去了最大权益，“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山东。拿奉天来说，根据中俄密约及其附属约章，所失主权并不比山东少。再从广东来说，被划为势力范围的年代虽比山东稍迟几个月，但和山东同样都被强占两处租借地，都被夺去铁路修筑权。所不同的是，广东强辟商埠一地，山东没有；广东被夺去内河航行权，山东没有。相比之下，也很难说山东受害比广东更深、山东的民族矛盾比其它地区更加尖锐。

不少论者又认为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发展于华北，是由于列强对华的侵略扩张是“南”轻“北”重，特别是列强投资或强行修筑铁路、开辟新式航运，引起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新变化。我查阅了1895—1899年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事实，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即“南”和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即“北”作了对比，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倒是南重北轻，情况有如下表：

	共 计	北 方	南 方	说 明
割让省分	1	0	1	
划分势力范围	5	2	3	
强租海港	5	3	2	
占领边界领土(外)	1	0	1	
永租地区	1	0	1	
新辟对外通商口岸	11	0	11	
强建租界	13	2	11	
扩大租界	5	1	4	
投资工厂、矿山(间)	20	6	14	北方6间中有4间为中外合资

至于俄、德夺我主权在北方修筑中东和胶济铁路，确实加速了北方地区，特别是铁路沿线自然经济的破坏，侵占民田，也导致了部分旧式运输工人的失业。然而，也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即铁路对于发展经济、加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已通车的铁路还吸收了不少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为它服务；而正在修筑中的铁路还使大量土方工人取得谋生之道。因此，在论述义和团造反的社会经济因素时，不宜把铁路的兴建估计过大。事实也表明，早在1888年到1894年先后通车的津榆铁路沿线，并不是义和团活动的重点，即使胶济路沿线也不是山东义和团活动的中心。而义和团兴起的鲁西北和直南地区更是远离铁路沿线。当然，京津和芦保线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的中心所在，可是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地位造成的，并非完全是铁路的原因。

关于海运大开导致内河运输量减少和旧式船夫失业方面的问题，更是南方与北方早在二、三十年前都存在的事实。特别是清政府自1898年给予列强内河航行特权以后，南方旧式航运业所受打击尤其严重，而山东、直隶所受影响极微。由此可见，把激起义和团在山东兴起的社会经济因素归之于海运的开辟虽然有些道理，但同样不宜夸大。

不少论者还认为义和团兴起于山东，是山东的教会压迫剥削在全国最为严重，山东的民教矛盾在全国最为尖锐。可谁都知道，基督教在华布教的重点是在南方诸省，山东当不是势力最大的地区。就天主教的势力来看，山东洋教士的人数不仅远不及直隶，也不及蒙古和广东；山东教堂和教徒的数目也少于直隶。据统计，1900年山东、直隶等省天主教的概况如下表：①

省 份	洋 教 士	教 徒	教 堂(总 堂、 会 所、住 堂……)
直 隶	77	122,000	1589
山 东	56	80,000	579
东 北 三 省	56	45,000	
广 东	58	42,000	95
蒙 古	83	33,000	243
湖 北	24	30,600	50
山 西	30	22,700	

洋教士、教徒和教堂的数目，一般地说是能够说明洋教势力强弱程度的，可是从上表看来（包括各省总人口与教徒、洋教士的比例）也得不出山东洋教势力的扩张超过其它省分的结论。以山东本省来讲，当时天主教在此分为南、北、东三个教区。1900年，北区洋教士13人，教徒25,000人；南区洋教士30人，教徒44,000人；东区洋教士13人，教徒10,000人。可是义和团兴起的主要地区则属北区，而不是天主教势力最大的南区。就是在北区，义和团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却恰恰在“无洋教士长住”，“并无洋式教堂，教民

①按《拳祸记》所载数字统计。

不多”的平原县，以及“全县仅教徒14家，从无教堂”的清平县。^①

综观上述情况，十九世纪末全国各地都遭受到列强的严重侵略，山东地区受害并非特重而超过了其它地方，因此，义和团兴起于山东的原因，如果主要或过份强调列强的侵略，笼统地提及民族矛盾和民教矛盾最为尖锐，就无法令人信服，显然还应对山东地区的特殊性再加探讨，具体分析。

二、社会经济原因

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反抗斗争都有它的社会经济根源。山东在十九世纪末叶，经济格外凋蔽，自然灾害特别严重，无疑成为义和团首先在此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自然灾害是旧中国最大的祸根之一，其中水旱灾为害尤甚。据1895—1899年不完整的统计，水灾几乎遍及全国，情况如所列重点地区统计表：^②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直 隶	被灾州县数	47	48	39	55	37
	被灾村庄数	4,084	3,733	2,798	3,159	2,067
	灾别	水、雹	水、雹	水、雹、虫	水、雹	水、旱
山 东	被灾州县数	62	52	55	61	48
	被灾村庄数	18,602	1,468	7,497	24,131	7,572
	灾别	水、旱、风、沙、碱	水、旱、雹、风、虫	水、旱、虫、风、沙、碱	水、旱、虫、碱、沙	水、雹、虫、沙、旱
河 南	被灾州县数	54	55	54	6	44
	被灾村庄数	/	/	/	1,064	/
	灾别	水	水、虫	水、旱	水	旱、雹
江 苏	被灾州县数	53	57	57	47	55
	灾别	水、旱、风	水、旱	水、旱	水、旱	水、旱、风
安 徽	被灾州县数	38	36	37	35	36
	灾别	水、虫、风	水、旱、风、虫	水、旱、风、虫	水	水、风
浙 江	被灾州县数	13	25	51	56	46
	灾别	/	水、旱、风、虫	水、旱、风、虫	水、旱、风、虫	水、虫

从上表不难看出，山东几乎集中了各种灾害，而水灾更远远超过了其它省分，成为全国灾情最严重的地区。正如当时山东巡抚张汝梅所说的，1898年黄河漫溢，“东省灾情奇重”，形成“一省偏灾”的局面。由于水漫庄稼田地，山东全省麦收仅止一半；鲁西北

^①《山东义和团案卷》，以下简称《案卷》，第2、16、411页。

^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35页。

黄河两岸地区水灾更重，竟致颗粒无收，以致饥民遍地，“纷纷迁徙”。①黄河泛滥，又影响到流贯鲁西北的运河，导致“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②这样，黄河水患加上运河灾害的结果是农业凋蔽，造成为数巨大的饥民群。尽管清政府也发放一些赈款，然而本来就是杯水车薪，加上各级官府层层折扣中饱，结果是徒负虚名，灾民受益很少。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以治黄为名，把负担转嫁给沿岸受难者。当时，黄河沿线州县每年还须派伏派款治河，如山东惠民一县，每年派伏看守黄河之费用，“统计每年合境费京钱几万缗。”③这笔负担又落到惠民人民身上。而教堂、地主官僚又趁火打劫，藉机重利盘剥，“高抬粮价，囤积居奇，穷民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必容若辈之剥削，遂至事起（指义和团起义）仓卒，纷争不已”。④

“饥寒起盗心”，历史上的农民反抗斗争往往从此产生。十九世纪末鲁西北的经济状况，无疑是促使“民心日益惶恐”，“遂至事起仓卒，纷争不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义和团之所以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地指向各地的教堂和教民，又和这些教堂、教民当时乘机抬高粮价、囤积居奇、肆意坑害百姓大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义和团兴起的地区恰恰又是鸦片生产的地区。把鸦片生产与义和团的兴起相联系，似乎是荒唐的。然而，事实上又确有某种关联。山东是沿海各省种植鸦片的主要地区，而其中恰恰又是义和团兴起的曹、沂、济、兖等鲁西北，诚然，“罌粟利厚，倍蓰稻粱”。但是，正如李秉衡于一八九七年所说的种植鸦片，“其利未收其害见”。⑤鸦片为害人们身心，姑置不论。大量种植鸦片的结果减少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使农民自给率降低，本来就缺粮的这些地区，粮荒问题就更严重了。不仅如此，随着鸦片种植而来的是走私猖獗。于是，走私贩子、冒险分子、赌徒、流浪汉、娼妓等等人云集，出现了黑社会集团和流氓无产者群。而且，当时经烟台进口的鸦片又急剧增加。1899年和1897年比较，不论在数量上、金额上都猛增四倍以上。然而，这种情况并未使济、曹、沂、兖各州县的鸦片生产减少，这些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仍继续扩大。⑥这样，黑社会集团和流氓无产者集团在人数上亦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又相继裁兵。自1896年起山东决定裁汰各种兵丁一半，到1898年已裁去2,000多人，邻近的直隶到1899年已裁去7,000多人，河南则“裁七留三”。⑦这样，失业的士兵又源源补充到黑社会群、流氓无产者群。从而，上述三种人就构成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也是义和团成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众所周知，农民是义和团的基本成员，他们主要在本村或邻近村镇活动。而四处传播、担负组织串联工作的却是长期从事秘密宗教活动者和上述流动者群。1898年安徽涡阳牛师修起事，乃“半为饥寒所迫”。⑧1898年，山东、江苏大水，清廷见“饥民甚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59、4316页。

②参见《清史》第2册第1576页。

③《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790页。

④劳乃宣：《拳案三种·拳案什存》卷下第7页。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72页。

⑥《中国海关年报》1892—1901年，第1卷第5545页。

⑦《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59、4313、4444页。

⑧《清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313页。

众，易于勾串”，十分担忧他们起来造反。①以朱红灯活动的主要地区来说，平原义和团“其人皆外来，其中多游勇”。②高唐州也是“拳匪游勇，到处滋扰”。从这一地区的主要领袖来说，也多为流民者群。朱洪灯“家无亲属，只身游荡”。③僧心诚是四方串游，两个寺庙的主持人。于清水家无老少，“有些流氓”。王立言“做京货生意”，“好赌博”。此外，有当“差官”的，有吃鸦片而破落的地主，等等④。

此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遍及城乡的洋货倾销和日益严重的“银贱钱荒”，是甲午战后全国的普遍现象，亦是直接导致人民生活困苦和加速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对山东的影响又特别大，一是表现在发行昭信股票，山东与四川一样按亩摊派，为全国罕见；二是山东的“银贱钱荒，实视各省为甚”，⑤人民受害又大于他省。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等因素使得山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由此而产生的饥民和黑社会集团在走投无路之际，勇往参加义和团，是义和团兴起于鲁西北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经济因素。

三、义和拳的历史和群众基础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的西北部以及毗邻的直隶南部、发展于华北，是和白莲教系统的义和拳在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群众基础紧密联系着的。

以宗教形式发动农民反抗斗争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也是中国农民战争的一个特点。有清一代，白莲教系统的秘密宗教和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社，由于它的成员是农民或破产了的农民，因而这两个组织成为农民“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和反抗“当今”的核心力量。近代后期的反洋教斗争也多是这些组织发动和参予的。资产阶级尽管从内心里看不起农民，更不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伙伴，但由于自身力量微弱，又处于秘密状态，也不得不借助秘密会党的力量来进行革命，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概莫例外。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天地会系统多分布于南方各省，白莲教系统则主要分布在北方各省。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天地会和白莲教始终作为两支重要力量活跃在南北中国。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天地会多与南方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并纳入了他们的活动轨道。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北方基础薄弱，政纲又与义和拳不同，遂放弃了对义和拳的领导。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义和拳便在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为反帝爱国运动。这里，我们还必须考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省和北方各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否认的差别。前者较为进步，后者较为落后。这也是南方的秘密会社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纷纷举行起义，而北方却在义和拳这种固有的落后形式下，打出“扶清灭洋”旗号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白莲教系统分支林立，又彼此不断地相互溶化与分裂。早在乾隆年间，

①《清德宗实录》第418卷第2页。

②《义和团》第1册第356页。

③《案卷》第470，19页。

④《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第218、223页。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71、4285页。

义和拳就在直、鲁、豫交界地区以“邪教”问世，不断起义，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历程。白莲教系统的其他分支也相继起事，其中以1874年清水教王伦起义、1812年李文成、林清的八卦教起义规模最大。鸦片战后，白莲教、黑旗军、习文教和长枪会又都在鲁西北及其邻近地区起义。这些起义相继失败以后，其余部仍分布在鲁西北及其附近各州县继续活动。他们虽然“不敢公行啸聚，”却在民间“私相传习，蔓延颇广”。①毗邻鲁西北的直隶各州县，如景州、威县、曲周、交河、清河、沧州、束鹿等地的白莲教也是活动颇为频繁，始终未绝。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民族矛盾空前剧烈，义和拳和白莲教其它支派的秘密宗教、民间结社、可能还有少数乡团逐步结合。这种大结合不仅迅速扩大了以义和拳为中心的斗争力量，并且使义和拳得以逐步公开。因为列强虎视，国难当头，而经过结合之后的义和拳以习拳练武、刀枪不入、自卫身家相号召，反对洋教欺压，大得人心。于是，“传习愈多，几乎无处无之”；②况且“在会之人，并不自知犯禁，方且明目张胆，不畏人知。”③这种人多势众局面的出现和拳民们正义在胸、不畏人知的革命精神，既逐步改变了义和拳原来秘密活动的方式，也迫使地方官对义和拳逐渐改剿为抚，从而使义和拳在甲午战后一步步发展成为公开的团体，矛头所向，直指外国在华教堂和传教士。冠县的梅花拳和红拳在义和拳的名称下，大张“扶清灭洋”旗帜迅速发展起来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冠县梨园屯义和拳的兴起对于义和团运动有着特殊意义。十九世纪末，“直、东、豫边界拳民不下十余万人，均服从洛珠（赵三多）号令”；梨园屯拳民小头目高六者，“其徒亦有千余人。”④“被诱者咸以为神。以一授五，五日五徒再授，旬日之间，已遍行省。”他们“托词义愤，……愚民无知，从而附和，其势益炽。”⑤冠县义和拳“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⑥“十余万人”，“旬日之间已遍行省”云云，当有夸大之处，然而人数之众，发展之快却是可以想见的。大抵直隶威县、曲周等义和拳“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流入东昌各属，再自东昌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⑦又有记载说，义和团“发难于”冠县之“十八团，遂及曹州，蔓延直隶。”⑧这些资料表明，冠县义和拳虽则只是许多支派中的一支，但是，星星之火，却从此燎原了。

至于说冠县义和团有没有少数乡团的成分，我认为张守常同志在《梨园屯教案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是值得大家重视的。张文指出：“劳乃宣说《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指出义和团源出白莲教，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作为义和团运动发源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中的义和团，却与白莲教无关。”“根据当时的文献或事后的回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第4页。

②《义和团》第4册，第455页。

③《古春草堂笔记》

④《义和团》第4册，第443、451页。

⑤民国《冠县县志》第10卷第17页。

⑥《义和团》第1册第304页。

⑦《义和团》第4册，第443页。

忆，都说明从梨园屯教案，经义和团运动，到景廷宾起义，在这里的赵三多为首的义和团是乡团，和设坛场、请佛爷，以宗教形式发展起来的义和团不是一回事。”张文的这一观点和《威县县志》上的提法是一致的，该县志提到：直隶威县在义和团起事后，“各乡团颇有受迫胁者。”①威县又正是赵三多活动的重点地方，赵三多的队伍中从此掺杂了乡团成分当可以成立。可见，张汝梅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亦不是没有根据。正因为和拳中掺杂了少数乡团，才促使张汝梅进而想把所有义和团“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②当然，乡团也好，结社也好，都统统一度纳入了白莲教的义和拳却是可以肯定的。

由上可见，义和团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与历史悠久、基础雄厚、长期活跃在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能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把千百万贫苦群众和地方士绅聚集在“扶清灭洋”战旗下，誓为中华杀出一条生路大有关系。

四、清政府的态度

一个政权，除了它在最后崩溃时，一般地说，是能够左右国内政局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和山东地方政府亦不例外，它们对于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避而不谈或简单地否定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和南北督抚态度的不同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山东和北中国的督抚，恪守后党朝廷的谕旨，义和团兴起并发展起来了。南方督抚对于后党政府的谕令阳奉阴违，并认为是“矫旨”，“断不奉”，对于群众反洋教斗争采取无情镇压手段，使得反帝运动没有形成，并出现与帝国主义“互保”的奇特局面。对比之下，情况迥异，泾渭分明。

1900年以前，南方各地的教案，反占领海港，反饥饿抢米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然在规模和次数方面都超过了北方，但都相继被镇压下去，没有形成更大的风暴。北方则不然，在义和团兴起后，山东和北方的督抚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它有助于义和团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甲午战争到1899年，山东历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之中，李、毓以“抗洋助拳”而著称，张汝梅的态度基本上是沿袭李秉衡的方针和采纳其当时下属毓贤的建议办事的。因此，他们之间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在列强步步进逼面前，朝野上下抗洋之心与日俱增。两者之间，相互影响而又彼此关联。抗洋，既是爱国心的表现，也包含着盲目排外因素。爱国心中寓有排外性，排外性中包括着爱国心。在长期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与愚昧无知的人们中间，是无法区分其爱国心与排外的界线的。列强的侵略加速了爱国主义的发展，也助长了排反性的滋长。义和团与李秉衡等官员，都是在上述思想支配下和“扶清灭洋”的纲领双方逐步靠拢的。

甲午战后，山东多次发生教案。德国在巨野教案中，“借端生衅”，提出种种无理

①民国《威县县志》第8卷第30页。

②《档案》第15页。

要求。“素不喜谈洋务”的李秉衡坚决拒绝，乃至以去就相争。他说：“衡即获罪，未敢遵办”。还说：“倘因处理失平，致犯众怒，更恐变生不测，愈难收拾”，“因此民心不服，激成变端，则安治泰之性命或不可保，其开衅更大，仍为国增累。不如将衡奏请治罪，借以谢过”。①李秉衡虽然镇压过大刀会，但是在他长期处理民教纠纷过程中，对洋教势力的横行不法而深感不满。从而认为对起而反抗洋教的群众不能“一概剿捕”。因为“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②李的上述言论，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内外交困的处境，它既激起了爱国自尊之心以图抗洋，也害怕压制人民抗洋而激起“不测”，而引起更大的“变端”。与此同时，又害怕抗拒列强“为国增累”。经过权衡，李秉衡还是采取了“仇洋助拳”的方针。“凡遇教案，持平飭办，不肯阿依外人”。③对拳民“不惟不禁，反以为义民。教士乞援地方官，官知中丞，置之不理”。④及李秉衡在德国的压迫下去职后，在官场中特别是山东激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仇洋之心在人们中间更加发展。因此，“拳民倡义，先得人和”。⑤

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于1898年奉旨派臬司毓贤前往曹州，“就近调队将大刀会切实弹压”。张同意毓贤的复禀：“并无大刀会匪滋扰情事”，认为“所禀教民矫横，藉事欺压良善，本是实在情形，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⑥进而采纳了毓贤和藩司张国正的建议，檄行各属，“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不准怀挟私忿稍滋事端，以杜流弊而消乱萌”。⑦这个方针被清王朝所认可。它在义和团运动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从统治者来说，藉此把义和拳纳入其地主乡团之轨道，以便控制。对义和拳来说，则获得公开合法地位，有利于发展。1899年3月张汝梅去职。这里，顺便澄清一下张汝梅去职的原因。有的同志为了把当时的义和拳说得力量强大，乃致把张汝梅的去职，说成是他镇压义和团不力而被罢官的。其实不然，据《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5年正月上谕说：“山东巡抚张汝梅，性喜逢迎，用人不当，要差优缺悉委私人，……及治河谬妄，百弊丛生，办赈不实，始终掩饰，捕务废弛，劫案迭出……”。二月上谕：“山东巡抚张汝梅著开缺，听候查办”。三月上谕：“该抚既被参劾，物望未孚，惟尚无赃私劣迹，著降二级另候简用”。显然，张汝梅的去职与义和团无关。

毓贤继张汝梅为山东巡抚后，继续推广其以抚为主的政策，明确表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⑧他“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在按察使街设厂”。他去访兖州时，途遇拳民对他“持刀枪出迓，中丞赏以银两。谕善习法术，以期大用”。⑨又如当

①《清季外交史料》第120卷第21、27页。

②《档案》第4、6页。

③《续安阳县志》第16卷，《人物志》。

④增补《拳祸记》上册，第21、27页

⑤《档案》第18页。

⑥《档案》第12、13、14页。

⑦《档案》第15、16页。

⑧《四朝佚闻》第23页。

⑨《拳祸记》下册第345、346页。

平原教案发生后，毓贤一再批示：“不得轻信教民一面之词，率行拏办，以致民间不服也”。“民教生事之案，总以持平为主，不得以教民所开之名单即行拘拿。倘概指平民为匪，动辄言剿，该县（指蒋楷）居心先不公允。”查民教互闹之案，不得专以匪论，总以开导解散为主”。①后来，由于蒋楷、袁世教在处理平原杠子李庄民教相争时，没有遵照他的“开导弹压，不准孟浪生事”，“务期解散”的指令，②出现了森罗殿之战，因而，毓贤以蒋楷“始则纵役诈赃，舆论不恰；继而张皇失措，民变几起”；营官袁世教“误伤良民”。③分别予以“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撤去统带，随营历练，以观后效”的惩处。④综上所述，毓贤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是明显的。至于毓贤在交卸巡抚前夕，诛戮了朱红灯等三位团民首领一事，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毓贤之所以采取招抚义和团的方针，是基于他的“仇洋”情绪，然而，这种态度并不等于他宁肯冒丢官的危险而去支持拳民。当他的行动已招致列强的极力反对，并因此而被开缺之际，杀几个团民去平息列强之怒，藉以保全自己的宦海前途，在半殖民地的国度里，作为一个追求权势而沈浮宦海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

继毓贤而任巡抚的袁世凯，他究竟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当前分歧较大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袁一上任，就是采取疯狂的屠杀政策，另一种意见认为袁在初期是采取“晓谕解散为主”，即以抚为主的方针，只是到了1900年6月以后才采取屠杀政策。个人是坚持后一种意见的。

持第一种意见的一些同志，为了说明袁世凯的屠杀政策，把1899年7月4日袁世凯关于防止德国扩大侵略的上奏，断言它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义和团，也是他毛遂自荐要取毓贤而代之的阴谋。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袁世凯在这份奏摺中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明了：“为德夷搆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以杜藉口而戢戎心，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窃维德夷窥伺山东，蓄意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地形，而搆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且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倘滋他族偏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据此，袁世凯提出四条条陈：“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避员驻胶”。从全文来看，目的是为了防止德国以胶澳为基地扩大侵略。虽有“持平”办理民教，免资藉口之意，但不是以镇压义和团为目的的。奏折上达四天后，即7月8日，军机处奉上谕以袁奏称：“德国搆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责令毓贤“查照办理”。⑤这就明显地表述它的目的所在。还值得注意的是，袁摺中所表达的这种意图和当时刘坤一、荣禄等人对沂州教案和山东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刘坤一甚至更进一步提出自己愿统率一军进驻徐、淮，另请荣禄在所属袁世凯、董福祥、宋庆和聂士成诸部中抽派劲旅，“即日上路，驰赴山东，会同本

①《案卷》第6、12、13页。

②《档案》第34、35页。

③《案卷》第14、18页。

④《档案》第36页。

⑤《档案》第28—30页。

地官兵直取胶澳”。①刘坤一的建议被荣禄部分接受，于1899年5月派聂士成前往直鲁交界地带，派袁世凯率军前往山东德州、沂州等地，以“操演阵法”为名，向德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当时，袁世凯及其部下对自己的任务是明确的，正象袁本人在5月16日从德州写给密友徐世昌的信中所说：“此来将士甚为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②事隔五天，袁又在另一封信给徐的信上写道：“士卒气志大可一战，惜不能耳。”③袁世凯的7月14日奏摺是紧接着德州演习之后上呈的，从其内容和前后过程来看，与镇压义和团一事基本无关。至于说这个奏折是袁毛遂自荐要取代毓贤充当山东巡抚，更是出于臆断。以当时袁的地位，想取代仅仅上任三个多月而又是清廷王公贵族赏识的毓贤，只是一种想当然罢了。

事情很显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取代毓贤，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对袁的赏识和推荐，而帝国主义之所以赏识袁，又主要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新式军队和袁本人不象毓贤那样顽固守旧，要用他来镇压义和团。正由于袁为列强所推荐，清政府虽迫于压力将袁任命，但对他极不放心，生怕他到任后对义和团采取激烈手段激起事端，便在袁世凯接任的头九天连下三道电谕，一再强调“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否则，“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④态度之坚定，逾乎言表。当时，不少京官在袁接任之初，甚至还未接任之际，就纷纷弹劾他“意气用事，徒恃兵力”。⑤说他“立议先剿后抚”，势必“祸起燎原，不可收拾。该抚自问，能当此重咎否耶？”甚至请求清廷将其免职。他们认为，对于义和团“喻以理则解散无难，怵以兵则变端立起。”京官的态度如此咄咄逼人，清廷又认为京官所言“持平”办理民教纠纷“语多中肯”，“其所陈慎重兵端，整顿吏治，尤为扼要之论”，命令袁世凯按此认真办理，⑥这又给袁以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山东的府县等地方官员的主抚态度也不能忽视。袁世凯自己承认，山东官员“懍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由于“拳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官吏不敢逼前”。⑦1900年3月，泰安府的情况是“查禁的谕旨已发布，军队已到，但无用处；泰安府地区官员毫无作为，朝廷密令予以鼓励”。⑧泰安知府则禀请袁世凯说：拳民仇教，“其根实由教民之太横”，从而提出绥靖方案：一、“严禁将来以遏乱萌”；二、“不追既往以安众心”；三、“持平民教以绝祸源”。袁自己也承认“所议查办拳教三条尚妥洽。”东昌知府也向袁世凯表明，对于义和团“此际操之太急，势必激成变端。惟有反复开导，俾其解

①《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35页、2249页。

②《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15页。

③《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16页。

④《档案》第46、47页。

⑤《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9页。

⑥《档案》第49、50、45、44页。

⑦《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9页。

⑧《英国兰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6页。

散”。①就是袁世凯采取以抚为主的严禁方针，各地官员也“是阻挠破坏”。②

上述种种，说明西太后、京官和山东地方官员的态度是吻合的。当时的袁世凯不同于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毕竟羽毛未丰，他既不敢公然违抗“圣旨”，亦不敢过分迨慢同僚，就是对其下属也还一时无力强制。所以，这个本来打算“先剿后抚”的袁世凯，也只好被迫改变对策。对此，他对密友徐世昌发牢骚说：“东省事从何办起，只好暂作停顿”，③而采取“总先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自当悉心设法，断不致操切激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一曰“持平”，“在于调和民教”；二曰“治标”，“在于绥靖地方”。④也就是他的下属所说的：“仰见宪台于警飭寮属之中，寓绥靖地方之至意”的方针。然而，袁世凯不失为统治阶级中的皎皎者，他把“治本”与“治标”相结合，软硬兼施，雷厉风行，致使山东义和团大体上在1900年上半年停止了活动，出现了各地“安谧”，习拳者“业已停止”的局面。⑤诚然，袁世凯在当时曾追捕杀害了几十名流动的拳民，但这正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中的剿的一面，不能以此来代替他的整个方针，只是在推行以抚为主方针时一个次要的方面。

袁世凯和毓贤的区别，在于袁采取严格禁止为主的抚绥政策，辅以镇压，而毓贤则是实行假禁止、不禁止，真支持，实鼓励的办法。

为了进一步说明山东地方官员对义和团的政策和影响，我们以在平县为例加以剖析。

“教堂林立”的在平是义和团最活跃的地方，1899年冬，“县治860余庄，习拳者多达800余处”，“遍及各村庄”⑥，并建立了以朱红灯、僧心诚为首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些论者往往以此来说明朱红灯这支义和团的英勇搏斗，发展迅猛和实力雄厚，其实，这不完全是义和团本身英勇斗争的结果，它还和在平知县豫咸的支持紧密相关。在《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资料选编》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豫官是旗人，他没有擎过神拳，也不杀神拳”，“豫咸在这里的时候，神拳设场子，他是不管的；”“神拳在张官屯组织唱了四天戏，豫官还去看戏贺神拳呢！那时候神拳正兴，各庄都有，豫官还给神拳开了赏”。一个长清的拳民常乐平在在平“抢了天主教的东西，被天主教告到豫大人那里，豫大人说常乐平是长清人，本县不应处理他”。在朱红灯被捕后，“当时豫官还是褊袒神拳”，有意放走拳民首领刘太清，等等。这就说明，在平义和拳之兴和豫咸的态度是不可分开的。否则，不用说残酷镇压，就是严厉禁止，也是无法达到村村有团的。豫咸的这种态度正是毓贤方针的典型表现。同是一个豫咸，可是在袁世凯属下，情况就回异了。为了禁止和解散团民，豫咸不仅“单骑往谕，力陈祸福”，还以金钱收购民团器械。继劝谕解散之后，就是镇压，类似等到“天主教反擎神拳，神拳不撑劲，豫官又擎神拳”的记载很多。⑦通过豫咸对拳民由支持到晓谕解散再到镇压的前后

①《案卷》第485—487，387页。

②③《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9页。

④《档案》第48，57，58页。

⑤参见《案卷》410，22，148，206，246，315，363页

⑥《在平县志》第8卷第18页；第5卷，军警志。

⑦《选编》第143页。

变化，正说明了由毓贤到袁世凯前后方针的变化。

当然，山东地方官的态度是与清廷的态度一致的。上面提到的同意张汝梅的“改拳为团”的方针，对袁世凯的旨令等，也就说明了这一点。总的说，清廷的态度虽然始终摇摆不定，但是逐步从招抚为主到全面招抚却是总的趋向。为什么清廷此时对于人民起义一反往日的单纯镇压而采取了上述政策呢？这，有它的主观和客观的多种因素，其要者有五：第一、甲午战后，特别是1898年到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以来，清王朝为了生存下去，思图抗洋以挽救垂危局面。1899年11月20日寄各省督抚的上谕就表明了这一点。它说：“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万一强敌凭陵”，“惟有理直气壮，敌慨同仇”，“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①在此之前，办团练，裁汰旧军建立新军，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等等，都是基于同一精神。1900年6月颁布向列强宣战的谕旨，正是上述思想的发展，而不是偶然的决定。第二，宫廷废帝立储之争，出现了后党和列强的矛盾。后党官员排斥情绪恶性发展，乃利用义和团之力进行排外以达到其废帝立储的目的。第三、当时的清廷内外交困，力量十分虚弱，害怕镇压激起更大的祸端，“以致腹地骚动”，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不得不采取“目前”的方针。第四、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难严重之际，不少人要求抗侮求存，对此，清廷不能置之不理。它对官方的“助拳抗洋”起了推动作用。第五、“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并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且可以为其服务。因此，出现了“扶清灭洋”与“助拳抗洋”相结合的特殊情况。

正是上述原因决定了朝廷的基本态度，而朝廷的态度又影响与决定了山东地方官的态度。山东地方官的态度又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义和团的发展，成为义和团兴起于山东的重要因素。

^①《档案》第37页。

沙俄在八国联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山东大学历史系七八级学生

苏位智

自六十年代以来，沙俄是八国联军的主谋和元凶这一提法，就在史学界广泛流传，沿袭至今。我认为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最先倡议联合出兵的是法国，而八国联军的主谋该是八国联军领导权的操纵者，可八国联军又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各国实力的消长不断变化，谁也无力争执牛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始终如一的主谋。纵观八国联军的全过程，我认为从其酝酿组合到最后撤兵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各国的地位都因事而易，沙俄所起的作用也不完全雷同，不能概以主谋论之。本文试以时间为序，从比较分析列强在八国联军中的地位作用入手，来看一看沙俄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

一九〇〇年一月至五月底，即从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第一次严重照会到决定联合出兵，这是八国联军的酝酿组合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强们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从清政府转向自身，决定亲自组织联军。

早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七日，鉴于刚刚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英国公使窦纳乐就在美、德、法、意等国同僚的支持下，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照会，要求发表一道上谕，宣布镇压排外团体。到2月27日，五国使节又向中国大臣提出另一件同文照会，还于3月2日一起“访问”了总理衙门，重申希望镇压义和团的要求。与此同时，五国公使还向本国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发布镇压排外团体的上谕，就联合有关国家在中国北部水域进行海军示威。^①值得注意的是，直到5月21日俄国参加的联合照会发出以前，俄国公使格尔思从未参加欧洲各国这一系列的共同行动，^②只将中国的形势向沙皇政府作了详细汇报，并以私人身份，通过总理衙门的一个章京建议庆亲王，“不要失去时机，在义和团还没有坚固和还没有在驻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③格尔思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完全是根据沙俄的指示；而沙俄政府此时的态度，又是完全取决于他们与其他列强不同的利益和目标。

首先，从眼前利益看，初起的义和团运动对沙俄威胁不大。沙俄政府认为，“义和

^①1900年3月10日《窦纳乐致索尔兹伯理电》《英国兰皮书》中国第三号第11件；

^②《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137页（以下简称《俄国的远东政策》）；

^③1900年4月18日《格尔思致穆拉维约夫电》第十七号，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下简称《红档杂志选译》）第213—215页。

团的仇恨主要是针对欧洲人的传教活动，这种仇恨由于欧洲商业和铁路利益渗入中国内地所引起的经济竞争而加深了。”当时，沙俄在华北地区的东正教多集中于京津一带，商业和铁路利益多在东北，它在义和团的爆发地——山东，既没有教堂，又没有商业网和铁路投资，用不着象其他列强那样着急。

其次，从战略目标看，沙俄政府始终是把对待京津地区的问题和他们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末，沙俄政府的既定国策是吞并中国的东北，进而称霸远东。在义和团运动初期，沙俄统治集团内部虽然在如何实现这一“狂妄”、“冒险”、“犯罪”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斗争，但财政大臣维特所代表的“银行加铁路”的征服政策，即所谓“和平的经济渗入”政策却在俄廷内占了上风。维特的观点很明确，即为了保持沙俄在满州的特殊地位，不要轻易激怒中国人。^①正如俄国皇子英加雷切夫所公开表露的那样：“我们希望西伯利亚铁路之建筑，不为所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满洲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手中。”^②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沙俄政府才极力频频作态，讨好以慈禧为首的亲俄政权，没有参与列强对清政府的恐吓和威胁行动。

五月下旬，各国列强看到义和团的反帝怒火在直隶和京津地区漫天燃烧，清政府内的排外势力又渐占上风，开始策划组织联军，以保住并扩大他们的在华利益。但是，由于各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不同，侵华方式不同，与清政府内各派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它们不仅对组织八国联军各有打算，而且在急切程度上也不完全一样。

法国是在中国宗教势力最大的国家，当时受义和团的直接冲击最厉害，因此“要求赔偿”和“复得”传教特权的心情特别强烈，^③武装干涉叫得最凶。5月19日，法国在京的主教樊国梁写信给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叫嚷北京四周已受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不过是一个掩饰，其主要目的是要消灭欧洲人，我们已处于和1870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请派一支水兵前来北堂，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④樊国梁的信给毕盛以很大的震动，他立即在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中传阅了这封信，并在20日下午召开的公使团会议上呼请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梁对形势的判断，正式建议共同调兵来京，保护使馆和教堂。当时，德国公使克林德首先支持调兵来京，以期共同扑灭山东义和团，帮助自己稳定并巩固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进而全面割据山东。^⑤但英国公使窦纳乐却反对法国马上调动军队的意见，害怕操之过急，弄巧成拙，使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遭受损失。他认为樊国梁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呼吁大家沉着应变，暂缓调兵。在窦纳乐的影响下，主张中国“门户开放”的美国、在华宗教势力不大的日本以及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都同意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然后再作调兵决定。

俄国公使格尔思先倾向于法国，对其调兵建议不仅“完全同意”，并且早在公使团开会的前一天就给政府发去密电，强调各国都将支持调兵来京，请求政府迅速“派遣载

^①参见《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83页；

^②《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12页。

^③《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52页。

^④1900年5月19日《樊国梁致毕盛函》、《英国兰皮书》中国之三，第273件附件五；

^⑤《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52页。

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决定在必要时召陆战队来此间。”①格尔思的态度之所以变得如此急切，主要是想把京津地区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挡在长城以南，如期实现“和平”吞并东北的计划，并乘出兵直隶之机，加强对直隶的控制，继续支持亲俄派在清政府内掌握政权，提高沙俄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然而，会上英国公使坚决反对调兵和大多数公使的附合，使格尔思非常为难。他既担心仓促调兵真会引起严重后果，又害怕激化由来已久的英俄矛盾，引起英国对沙俄欲图染指直隶的猜忌，也就转而同意了英国的意见。

鉴于以上情况，法、德只好放弃原议。各国公使一致决定于21日再次联合照会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如果五天内得不到对照会的圆满答复，便采取进一步措施，组织海军示威或调动军队登陆。

五天后，公使们认为清政府的答复是“一般性的”，②很不满意，便于26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和商讨调兵问题。法国公使毕盛又在会上抢先发言，列举他所得到的各种情报，并断言在北京将发生一次危及所有欧洲人的严重暴动，强烈呼吁共同调兵来京。这一次，毕盛的提议得到了包括窦纳乐和格尔思在内的各列强公使的同意。在这之后，义和团焚毁丰台车站的消息传到北京，各公使于28日开会决定，立即调集在华武装组成所谓特遣卫队前来北京，并电请各国政府增兵来华。实际上，法国公使在会前已经发出了调兵的电报。

从以上联军酝酿和策划的简单经过，可以看出法国是倡议列强联合侵华的元凶，英国对仓促出兵顾虑最重，沙俄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动摇于法、英之间，不是策划联合侵华的主谋。

（二）

一九〇〇年六月初至六月中旬，即从列强仓促调兵进京到西摩联军北犯，这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初期。在这一阶段里，列强们争先恐后派兵来华，共同挑起了侵华战争。

早在5月28日联合侵华政策正式拍板之后，列强们便仓促组织起四百多名侵略军，于5月31日和6月2日先后侵入北京。此后数日，英、俄、法、日、美、德、意、奥等国军队不断来华，麇集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队已达两千多人。其中英军最多，将近占各国军队总数的二分之一。

沙俄亦不甘落后，加紧调动军队。到6月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批准从旅顺口抽调四千陆战队迅速开往大沽，以便左右联军局势。然而，还未等这四千俄军从旅顺口动身，各国驻京公使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打击下，已开始向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频频呼救。到6月9日晚，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更在大沽接到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告急电报，第二天就带领着由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匆匆组成的第一批八国联军冲向北

①《红档杂志选译》第216页。

②《红档杂志选译》第217页。